

求于性灵,寄托遥深:况周颐《蕙风词话》 及其词学“性灵”说

邱悦¹ 周群²

(1. 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2. 南京大学 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 况周颐晚年取舍旧论,融综词学精髓,汇于《蕙风词话》。博览前人相关诗词理论观念,加之故梓濡养与乡贤开引,蕙风实现对“性灵”的肯认与积淀。为力矫常州词派比附过甚之弊,况氏直指其“呆寄托”的疏谬所在,并引入“性灵”而与“寄托”融通,由此,况氏以推举“词心”为思想核心,对诸多词学问题展开论述,遂成其词学“性灵”说。其说创辟之处,则在于改造“重拙大”理论,形成自身特有的词史观与填词之道,展现出“即性灵,即寄托”的词论立场与“恰到好处”的审美特征。

[关键词] 《蕙风词话》 况周颐 常州词派 词心 性灵说

作为清季词学大家况周颐的晚年总结之作,《蕙风词话》尽得况氏思想精髓,朱祖谋曾盛赞其“八百年来无此作”^①。蔡嵩云《柯亭词论》亦赞之“论词多具卓识,发前人所未发”^②,可见其词学史地位。

观《蕙风词话》,其语多涉“性灵”。全书五卷,明确提及者凡十二处,语义相关者更多而难计其数。除了以考证、谈丛为内容的第四卷外,余下数卷皆有“性灵”相关论述。可以说,“性灵”乃《蕙风词话》中极为重要的概念。

然“性灵”之要,素来为学界对其“重拙大”“词心”“词境”等概念的关注所遮蔽。事实上,这些概念皆与其“性灵”之说相系连。正如其弟子赵尊岳之跋语:“先生之词话,皆其性灵学问襟抱之复异乎人者所积而流。自言生平得力之处,昭示学者致力之途,而证以前贤所作,补救时流之偏弊,所论不徒泥章句,不驰骛高深。”^③《蕙风词话》位列“清末三大词话”的词学价值,亦涵括况氏对前人“性灵”观念的融综、总结,并系统性地将其引入词学领域。

一、临桂情结与“性灵”积淀:况氏词学“性灵”说的文化渊源与生成背景

况氏所言“性灵”之谓,自南朝始而代有所出^④,至明清而称盛。为芟薙拟古因袭的晚明文坛宿痼,公安力主“独抒性灵,不拘格套”^⑤;时至乾嘉,袁枚又以浩大声势专主“性灵”,其影响之深远无可争议。道光末年,《石樵诗话》承认道:“近日诗话之盛行宇内,无如袁简斋《随园诗话》,几乎家有其书矣。”^⑥晚清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二十五回亦提到“《随园诗话》是人人都看见过的”^⑦。对于生于晚清且家中藏书巨丰^⑧的况氏而言,“性灵”一词本不陌生,且其对力主于此的公安、随园亦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汉传佛教文学思想史”(18ZDA239)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邱悦(1993—),江苏南通人,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古代文学和文艺思想史。

① 唐圭璋:《词学论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833页。

② 蔡嵩云:《柯亭词论》,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4914页。

③ 况周颐撰,屈兴国辑注:《蕙风词话辑注·附录·蕙风词话跋》,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52页。

④ “性灵”一说,古已有之,于文论可上溯刘勰《文心雕龙》,于诗学可肇自钟嵘《诗品》中“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的论述;其精神内核,更发轫于老庄“法天贵真”“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自然求真与个性标举。

⑤ 袁宏道撰:《袁中郎全集》卷一《叙小修诗》,明崇祯二年刻本。

⑥ 李树滋:《石樵诗话》卷三,道光二十九年湖湘采珍山馆刊巾箱本。

⑦ 吴趸人著:《吴趸人全集·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上)》,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9年,第180页。

⑧ 况家藏书之丰,自况周颐伯父况澄编有《况氏家藏诗文集》《违碍书目》《家藏诗书目》可证。

颇有了解。《蕙风词话》中则录有“今人之论词,大概如昔人之论诗。……主趣者其公安之写意乎”^①之言。

更遑论词学“性灵”说,况氏亦颇有涉猎。作为重要的诗学范畴,“性灵”说为词论所吸收,且正式以“性灵”论词者,至清初已见。为《今词初集》作跋,毛际可指出纳兰性德、顾贞观二人以“铲削浮艳,抒写性灵”为选词准的^②。况氏对此显然稔知,以“纯任性灵”赞纳兰为“国初第一词手”^③。此后,“性灵”词论,多散见于诸家评说^④,另有随园门下子弟着力于此。杨芳灿评袁枚之子袁通“尤肆力于词,标举性灵”^⑤,力图以其宗风家学为词学“性灵”张目。常出入随园的郭麐则力主作者当“自抒其襟灵”^⑥,以“襟灵”别于诗学“性灵”而引入词学。郭麐《梅边笛谱序》称“自竹垞诸人标举清华,别裁浮艳……后之学者徒仿佛其音节……性灵不存,寄托无有”^⑦,于词力推朱彝尊而多论“性灵”;况氏于此亦深有认同,谓朱彝尊为国初词人之冠^⑧。于词坛中,“性灵”一说虽未有“随园而出而独标性灵,天下靡然从之”^⑨的盛况,但其进入况氏视野并不为怪。据载:“周颐……辄肆蒐罗,或从藏书家辗转传钞,十载京华,购求尤力,所收国朝词别集将及千家,薇省词亦将百家,各总集选本经刻行者略备……”^⑩可证知况氏于词学诸家之广收博览,其间则难免“性灵”词论之涉阅。

先行者的理论积淀与自身的广博关览之外,况氏的“性灵”肯认与乡梓情结不无关系。家乡于况周颐影响甚笃。其《垂丝钓近》等多首词作回忆家乡故景,《蕙风簃二笔》《香东漫笔》乃至《蕙风词话》等词话皆有广西风土人情之载,更亲纂《粤西词见》以汇临桂词作。溯及其词学“性灵”的文化渊源,当知是临桂自然的情性颐养与粤西人文的“性灵”底蕴共同作用的结果。

周颐先人随宦落籍临桂,其自幼便亲近山水自然。此间“镜里绿阴,旧染诗袖”^⑪,乃“地偏尘远词境也”^⑫。秀甲天下的桂林山水赋予其人之“性灵”的先天禀赋,也激起其对词之“性灵”的后天渴求,但更为重要的是,在况氏之前,“性灵”之风在粤西有着长期积淀。袁枚作为一代诗坛领袖,曾携“性灵”诗风至此。据杨钟羲《雪桥诗话》载:“当乾隆甲辰乙巳间……袁存斋亦来桂林,四方名宿……觞咏赠答,极一时缟纈之盛。存斋至比之赵文子垂陇之会。”^⑬这一盛况在袁枚《随园诗话》中亦有纪述^⑭,其后又录:“浦柳愚山长云:‘诗生于心,而成于手,然以心运手则可,以手代心则不可。今之描诗者,东拉西扯,左支右吾,都从故纸堆来,不从性情流出,是以手代心也。’”^⑮字字皆合袁枚之持论,可见“性灵”观念于彼时临桂诗坛亦颇有流传。至于况氏之时,“性灵”之风更是渗透入粤西词人的创作中:“吾粤词人,诚寥寥如晨星,然皆独抒性灵自成格调,绝无挨门傍户、画眉搔首之态,可传以此,不传亦以此,吁可慨矣!”^⑯

① 况周颐著,孙克强导读:《蕙风词话·蕙风词话续编》卷一《顾梁汾序侯刻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73-174页。

② 毛际可:《今词初集跋语》,纳兰性德撰,赵秀亭、冯统一笺校:《饮水词笺校·附录》,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509页。

③ 况周颐著,孙克强导读:《蕙风词话》卷五《饮水诗》,第143-144页。

④ 曹溶评陈大成词“能真吐性灵,不事雕绘,摆脱纒锁”(《影树楼词题词》),尊尚真情自然;顾贞观称“夫词者,乐府之余也。后人佣耳馥目,偏花斗叶,徒工粉泽铅华,性灵汨没,而乐府亡”(《澹桐词序》),直言“性灵”于词作之要;胡奕勋评词而称“此中盖有性灵焉,不尽关乎功力”(《玉雨词序》),推崇先天禀赋;程受易感言“按谱填腔,颇有似乎桎梏性灵者,更何从而挥洒如意哉”(《杏岑词稿序》)则有突破词律之意。以上内容参见冯乾编校《清词序跋汇编》(卷三、卷四、卷六、卷九),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281、405、548、905页。

⑤ 杨芳灿:《捧月楼绮语序》,冯乾编校:《清词序跋汇编》(卷六),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646页。

⑥ 郭麐:《桃花潭水词序》,冯乾编校:《清词序跋汇编》(卷九),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932页。

⑦ 郭麐:《梅边笛谱序》,冯乾编校:《清词序跋汇编》(卷七),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736页。

⑧ 况周颐:“或问:‘国初词人,当以谁氏为冠?’再三度,举金风亭长对。”参见况周颐著,孙克强导读《蕙风词话》卷五《金风亭长词》,第146页。

⑨ 郭麐:《灵芬馆诗话》卷八,清嘉庆二十一年刻增修本,第4页。

⑩ 况周颐:《蕙风丛书》第六册《薇省词钞》例言第3页,上海中国书店藏版,丙寅(1926)四月刊本,转引自郑炜明《况周颐先生年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2-23页。

⑪ 况周颐著,秦玮鸿校注:《况周颐词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308页。

⑫ 况周颐:《粤西词见序》,葛渭君编:《词话丛编补编·历代词人考略·附录一序跋》,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4540页。

⑬ 杨钟羲:《雪桥诗话三集》(卷七),民国八年吴兴刘氏嘉业堂刻求恕斋丛书。

⑭ 袁枚《随园诗话》卷十亦有纪述:“桂林向有诗会。李松圃比部、马嫌山中翰、浦柳愚山长、朱心池明府、朱兰雪布衣,时时分题吟咏。余到后,得与文酒之会,同访名山古刹。临时时,五人买舟相送,依依不舍。”参见袁枚著,王英志编纂校点《随园诗话》(卷十),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83页。

⑮ 袁枚著,王英志编纂校点:《随园诗话》补遗卷四,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709页。

⑯ 况周颐:《新辑蕙风词话续编》(卷三),孙克强主编:《清代词话全编》(第十四册),南京:江苏凤凰出版社,2019年,第219-220页。

如此属词氛围下,况氏对“性灵”亦不无认可。其有印文云“绿珠红玉是乡亲”,红珠、绿柳皆为人名,前者出身广西,后者埋香临桂。此举非为首创,袁枚就曾借用唐人“钱塘苏小是乡亲”句戏刻私印^①,况氏印文颇有效仿之意。故里乡情与“性灵”肯认交织萦怀,让故乡秀丽的山水更为持久深远地予灵魂以怡养,成为其后来性灵思想的源泉。

而对于自学词便“多性灵语”^②的创作倾向,况氏坦言乃受乡贤词作影响。蕙风曾于《粤西词见》缕陈故里词学:“综论国朝吾粤词人,朱小岑先生倡之于前,龙、王、苏三先生继起而振兴之,一二作者,类能摆脱窠臼,各抒性情,造诣所独得,流传虽罕,派别具存。”^③授业恩师王拯之外,亦提到朱依真、龙启瑞、苏汝谦等人,皆为牖启其词作的广右前辈;“国朝吾粤词人”中“一二作者”的番窠倒臼与性情发抒,更证知粤西词作的“性灵”传统,使他这位临桂词坛后学颇受沾溉。

其中,在况氏看来,朱依真不仅于广西词坛有首倡之功,而且在其师王拯的继起振兴下,更对况氏影响颇深,亦为其词学“性灵”的可溯之源。虽然因活动时代相歧^④,与朱依真并非赵尊岳所谓的“同里夙好”^⑤,但况氏对朱依真的仰慕却绝非虚假,词作更是受到朱氏的影响。况周颐曾苦觅朱氏诗词,并大加褒扬:“小岑先生《九芝草堂诗存》八卷,余得于海王村。《纪年词》求之十年不可得。检邑志得《绛都春》《念奴娇》两调,嫔诣精卓,风格在碧山、玉田之间。……观其所为词,固不落浙西派也。其论同时人词,意在以诗传人,不得以论古之作例之。”^⑥朱依真布衣之身,却在当年诗会中最得袁枚认可。据《三管诗话》载:“朱小岑布衣……随园老人至粤西时,与之唱和,推为粤西诗人之冠。”^⑦袁枚如此评价,无疑朱依真诗作至少并不与其诗学倡举相左。事实上,自朱依真存世不多的诗论中,的确可以看到他对诗歌抒写“性灵”的推崇,如《李厓竹宗澳志于诗,间以诗法质予,愧无以答其意,为述古今得失,平日自厉者赠之》一诗论及诗法,直言曰“至于抒性灵,随境披心胸”^⑧。

更为人所知而开引蕙风词学之人则是临桂黄苏,其虽论词重寄托,却亦对况氏“性灵”有开蒙之功。据《香东漫笔》所录:“蓼园先生,有词选梓行。……余年十二,女兄……诒余是编,如获拱璧。心维口诵,辄仿为之。是余词之导师也。”^⑨况氏已明确自认师承。而至《蓼园词选序》中重复肯认后,又引曩昔“吾性灵与浹而俱化,乃真实为吾有,而外物不能夺”之词论,称之“皆载在是编”^⑩。于其词作“性灵”启碁之意,呼之欲出。

然而,纵有临桂属词氛围与乡贤开引于况氏“性灵”大有裨益,但自有清一代的时代背景观之,“性灵”词论却始终只能屈居“非主流”^⑪。从“句琢字炼”而求之“醇雅”的浙西词派,到“情”归儒家诗教而修辞寄托的常州词派,皆与“性灵”相歧,而清代词坛又为二派所先后揽摄。故词学“性灵”之说,或零星而见,或一家之言,而未成声势,更难于理论有所突破。

“性灵”说于词学之维艰,况氏自有体会:“余自同治壬申癸酉间,即学填词,所作多性灵语,有今日万不能道者,而尖艳之讥,在所不免。”^⑫但这种认识何以未却其“词宜有性灵语”^⑬之识?况氏又如何接过前贤衣钵,以吸收、改造、总结的姿态步武“性灵”一说?此则不免叙及其针对常州词派的改造。

① 袁枚:“余戏刻一私印,用唐人‘钱塘苏小是乡亲’之句。”参见袁枚著、王英志编纂校点《随园诗话》(卷一),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7页。

② 徐珂:《近词丛话·况夔笙述其填词之自历》,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4227页。

③ 况周颐:《粤西词见跋》,葛渭君编:《词话丛编补编·历代词人考略·附录一序跋》,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4541页。

④ 朱依真(1743-?)为乾隆间布衣,得袁枚“粤西诗人之冠”的称扬;而况周颐(1859-1926)为咸丰九年生人,二者活动时代难有交集。参见王娟《况周颐词学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8-21页。

⑤ 赵尊岳:《蕙风词史》,况周颐著,孙克强辑考:《蕙风词话 广蕙风词话》,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471页。

⑥ 况周颐:《新辑蕙风词话续编》(卷三),孙克强主编:《清代词话全编》(第十四册),南京:江苏凤凰出版社,2019年,第219页。

⑦ 梁章钜撰,蒋凡校注:《三管诗话校注》,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43页。

⑧ 朱依真著,周永忠、梁扬校注:《九芝草堂诗存校注》(卷八),成都:巴蜀书社,2014年,第254页。

⑨ 况周颐著,孙克强导读:《蕙风词话·蕙风词话续编》卷二《蓼园词选》,第222页。

⑩ 况周颐:《蓼园词选序》,尹志腾编:《清人选评词集三种》,济南:齐鲁书社,1988年,第4页。

⑪ 曹明升:《清代词学中的性灵说——一种“非主流”词学理论的生存状态与词史错位》,《文学遗产》2022年第5期。

⑫ 徐珂:《近词丛话·况夔笙述其填词之自历》,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4227页。

⑬ 况周颐著,孙克强导读:《蕙风词话》卷五《词宜有性灵语》,第152页。

二、以“词心”矫“呆寄托”:况氏词学“性灵”说的重要成因与思想核心

蕙风虽列于临桂词派,实乃常州词派之后继。常州词派以比兴寄托、词体推尊之倡言为根基。正如龙榆生称况氏所在的桂派四人“承张、周之遗绪,而益务恢宏”,乃“五十年来,常派风流,未遽消歇”^①之证,桂派诸子皆常派后劲。而无论是来自端木采、王鹏运崇尚常州词派的影响,还是出于这位“况古人”鼎革之际的时代共感,都使况氏自觉接受常州词派推重兴寄的观念。以托校借阅之名,与缪荃孙晤访问,其获《常州词》《常州词录》《常州先辈论词》《国朝常州词录》等书而泛览常州词作^②。是以,况氏上承张惠言“意内言外”之端绪,释“意内”为“言中有寄托”^③,更强调为词寄托之“贵”,并未出乎常派门墙。

然而,承继常州词派寄托之要旨,并不意味着要囿于其偏失。况氏自学词而遍览词学典籍,汲取诸派营养^④,更为广博的视野使之清醒地认识到常派的问题所在。一如其弟子总结,为“补救时流之偏弊”,蕙风以“性灵学问襟抱之复异乎人者所积而流”^⑤成其词话。针对常州词派问题的纠矫,成为况氏词学“性灵”说的重要成因。

常派之弊早在建立之初就颇见罅漏。张惠言释词以“意内而言外”,而要求“义有幽隐,并为指发”,“触类条鬯,各有所归”^⑥。此常派开山之言本为扫除浙西疏空轻倩、佻染短钉之失,奈何矫枉过正,未免有比附穿凿之嫌。这一阙谬为周济所觉察,其以“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而稍作调适,并指出应“初学词求有寄托……既成格调,求无寄托”^⑦。对此,叶嘉莹先生之评点切中肯綮,她称张氏之比附为“随便以自己之联想附会古人之词意的漫无准则的说法”,周氏修正“恰好补救了张惠言的过于拘执比附的缺点”,使之“不致再有牵强比附之讥”,为常词“一大拓展”^⑧。然周济之匡矫,虽有补救,却未曾真正完善。或有继者不仅固守常州词派成法,甚至更进一步。比如庄棫所谓“托志帷房,睠怀君国”^⑨,就将本就武断的论调推向极端;而陈廷焯亦主张“寄托不厚,感人不深”^⑩,要求“意在笔先”^⑪,且“比兴中亦须含蓄不露,斯为沉郁,斯为忠厚”^⑫。由此,寄托生硬隐曲,滥调陈陈相因,使词格走向愈加狭隘。

末流失之伪凿,则常派固求寄托、失于比附之流弊渐为注目。道咸以降,则渐有“流为学究”“顾有以平钝雷同相警者”^⑬“顾学之者往往非平即晦”^⑭之驳斥。更有常派后学出言对固求比附作出矫抑。比如端木采“论者但以本意求之,性情深至者,文辞自悱恻,亦不必别生枝节,强立议论,谓其寓言某事也”^⑮之言即有此意。

沿此常派救弊之路,况氏一针见血地指出“呆寄托”^⑯问题,直指常派比附经义、固求寄托之失,批斥那些“二物相比附”的“所谓寄托”是“横亘一寄托于搦管之先,此物此志,千首一律,则是门面语耳”^⑰。况氏诸多论述,尽道出此“非真”的“所谓寄托”之疏谬所在:

其一,从词体本身来看,其本质上并非狭隘的比兴寄托,更非儒家教化的工具。况氏从源头入

① 龙榆生:《龙榆生词学论文集·清季四大词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477页。

② 参见郑伟明《况周颐先生年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85-87、102-103、111-112页。

③ 葛渭君编:《词话丛编补编·蕙风词话补编》(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687页。

④ 况氏不囿于常州词派,比如曾借阅浙派中坚吴锡麒所撰作品:“1907年……二月九日,先生自缪荃孙借《有正味斋文集》。”参见郑伟明《况周颐先生年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68页。

⑤ 况周颐撰,屈兴国辑注:《蕙风词话辑注·附录·蕙风词话跋》,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52页。

⑥ 张惠言著,黄立新校点:《茗柯文编·词选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58-59页。

⑦ 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12、4页。

⑧ 叶嘉莹:《迦陵论词丛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344页。

⑨ 庄棫:《复堂词序》,陈廷焯撰,孙克强主编:《白雨斋词话全编·白雨斋词话》(卷六),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249-1250页。

⑩ 陈廷焯撰,孙克强主编:《白雨斋词话全编·白雨斋词话·自序》,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161页。

⑪ 陈廷焯撰,孙克强主编:《白雨斋词话全编·白雨斋词话》(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165页。

⑫ 陈廷焯撰,孙克强主编:《白雨斋词话全编·白雨斋词话》(卷二),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179页。

⑬ 谭献:《复堂词话》卷四,孙克强主编:《清代词话全编》(第十册),南京:江苏凤凰出版社,2019年,第206、242页。

⑭ 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卷十九),清同治八年刻本,第13页。

⑮ 端木采:《续词选批注》,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张惠言论词·附录》,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622页。

⑯ 况周颐著,孙克强导读:《蕙风词话》卷五《咏物先勿涉累》,第153页。

⑰ 况周颐著,孙克强导读:《蕙风词话》卷五《词贵有寄托》,第151页。

手,针对张惠言为尊词体而附会《说文》“意内言外”的提法,以《韵会举要》引《说文》所作“音内言外”^①而重释词之体性,视意内言外为词、调之关系,据此打破属词必寄托的藩篱,那些脱离“身世之感”、生硬附会大义之言则由此失之根基。

其二,从先贤经籍来看,其多发乎灵感,本无后人比附之义。“昔贤论灵均书辞,或流于跌宕怪神,怨怼激发,而不可以为训”^②,明确强行附会并无理据。

其三,从创作上来看,牵强附会绝非属词之道。“词过经意,其蔽也斧琢”^③,过分刻意的寄托是“横亘一寄托于搦管之先”的主题先行,是“为吾词增重”而“鹜乎其外”^④的“门面语”,故词不宜过经意。

其四,从作品来看,属词不尽须寄托,无寄托亦可出佳作。“夫词如唐之《金荃》,宋之《珠玉》,何尝有寄托,何尝不卓绝千古,何庸为是非真之寄托耶。”^⑤与微言大义的“非真之寄托”相权,《金荃》《珠玉》这般虽没有深厚内容却吐露肺腑的作品亦能卓绝千古。

既知常州词派“呆寄托”之失,况氏未改“词贵有寄托”的主张,而是作出“所贵者流露于不自知,触发于弗克自己”的补充。沿此理路,况氏进一步指出“身世之感,通于性灵”^⑥,由此引入“性灵”一说以救弊。况氏视“性灵”为“心领神会”而“胸次郁勃”^⑦的“至真之情,由性灵肺腑中流出”^⑧;性灵语刻意难为,“流露于不自知”^⑨,乃“真实为吾有而外物不能夺”^⑩。《蕙风词话》中多处强调“性灵”之要。况氏以“词之为道……陶写乎性情”^⑪而将“性灵”本身与词体相联结,指出意欲填词自然而未经人说,须“性灵流露”^⑫;而词之咏物,去以“呆寄托”,则能“自性灵中出佳”^⑬。

于是,秉承常州词派之旨,又基于其“呆寄托”之弊,况氏将其对“性灵”说的承继与总结,呈现在“即性灵,即寄托”^⑭的提法上。兼融二者,况氏提出词中的思想寄托不仅含“题中应有之义”,更在于“发抒襟抱”^⑮,将常州词派专于家国的寄托之论扩大到一切真情实感的自然发露。在这一点上,况氏将所贵“寄托”进一步表达为对“襟抱”的强调:“填词第一要襟抱。”^⑯相较于那些流于教条、装饰门面的“呆寄托”而言,此“襟抱”更源乎词人内在真情,所谓“作词……能句中有意即佳”,且“意必已出”^⑰,即此之谓。而“吾有吾之性情,吾有吾之襟抱,与夫聪明才力”,方能不落人后、不降词格^⑱,其重点也正在于不似他人、发自内心的身世之感。正是基于这样的观点,况氏批评“晚近某词派”在词体创作上“自附高格,涂饰金粉,绝无内心”^⑲之失,明确内心真情在词作中的统摄地位。

显然,况氏“即性灵,即寄托”的词学主张,相较于前人对常州词派流弊之纠矫,更为直截、超越、圆融与中肯。其既可说是引“性灵”入常州词派,表现出对儒家诗教的疏离,而改造温柔敦厚、兴寄托旨;亦可谓以常州词派兴寄之说平衡“性灵”执求内心而背离现实之过。由此,“性灵”词论以融通常派之势,于主流词学的遮拨中突围。

而为更好地融通“性灵”与“寄托”,实现其词学“性灵”,蕙风论阐并推重“词心”之说:

① 况周颐著,孙克强导读:《蕙风词话》卷四《意内言外》,第101页。
 ② 况周颐著,孙克强导读:《蕙风词话》卷五《词贵有寄托》,第151页。
 ③ 况周颐著,孙克强导读:《蕙风词话》卷一《词不宜过经意》,第6页。
 ④ 葛渭君编:《词话丛编补编·蕙风词话补编》(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687页。
 ⑤ 况周颐著,孙克强导读:《蕙风词话》卷五《词贵有寄托》,第151页。
 ⑥ 况周颐著,孙克强导读:《蕙风词话》卷五《词贵有寄托》,第151页。
 ⑦ 况周颐著,孙克强导读:《蕙风词话》卷一《学词须先读词》,第13页。
 ⑧ 况周颐著,孙克强导读:《蕙风词话》卷二《周姜词朴厚》,第29页。
 ⑨ 况周颐著,孙克强导读:《蕙风词话》卷五《词宜有性灵语》,第152页。
 ⑩ 况周颐著,孙克强导读:《蕙风词话》卷一《读词之法》,第9页。
 ⑪ 况周颐著,孙克强导读:《蕙风词话》卷一《词非诗余》,第3页。
 ⑫ 况周颐著,孙克强导读:《蕙风词话》卷一《选句要自然》,第8页。
 ⑬ 况周颐著,孙克强导读:《蕙风词话》卷五《咏物先勿涉呆》,第153页。
 ⑭ 况周颐著,孙克强导读:《蕙风词话》卷五《词贵有寄托》,第151页。
 ⑮ 况周颐著,孙克强导读:《蕙风词话》卷一《名手作词》,第11页。
 ⑯ 况周颐著,孙克强导读:《蕙风词话》卷二《填词要襟抱》,第32页。
 ⑰ 况周颐著,孙克强导读:《蕙风词话》卷一《作词要句中有意》,第15页。
 ⑱ 况周颐著,孙克强导读:《蕙风词话》卷一《宋词宜多读多看》,第16-17页。
 ⑲ 况周颐著,孙克强导读:《蕙风词话》卷一《不必学唐五代词》,第17页。

吾听风雨,吾览江山,常觉风雨江山外有万不得已者在。此万不得已者,即词心也。而能以吾言写吾心,即吾词也。此万不得已者,由吾心酝酿而出,即吾词之真也,非可强为,亦无庸强求。视吾心之酝酿何如耳^①。

所谓“词心”,冯煦倡始之而自言导源于司马相如“赋心”之论^②,况氏继之而赋以丰富蕴涵。“词心”者,词人之“性灵”也,其既出于“至真之情,由性灵肺腑中流出”^③的性情感受,亦表示属词之天赋灵感。此处,蕙风将“词心”阐释为“吾心”在“听风雨”而“览江山”之时“觉风雨江山外”而“有万不得已者”,即在属词构思时,主体受到外在景物环境的触动而迸发出的写作灵感与无法遏制的创作冲动,为词人特有的基于情景感受而展开创作的禀赋与能力。事实上,况氏对“性灵”的认识本身就寄寓着“胸次郁勃”^④这样灵感层面的认识。而“此万不得已者,由吾心酝酿而出,即吾词之真也”的论述又与袁枚“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有必不可朽之诗”^⑤相契,不仅昭示况氏对袁枚灵感阐论的消化,且更进一步地指向“词心”与“性灵”的联结。可见,对“词心”的推举,是况周颐词学“性灵”说的思想核心。

围绕“词心”之论,况氏词学“性灵”说的诸多论述据以展开。“词心”的实现,兼有“万不得已”与“吾词之真”,更以“词境”为前提。从词体本身而言,“词心”之“万不得已”作为触发词人创作的内驱力,“由吾心酝酿而出”,明确指出了词体表现人心的“内化”特质;从作词天赋与灵感上论,况氏看到所谓“万不得已”者在成就“吾词之真”上的价值,即其作为推动“词心”酝酿生发“吾词”的内在源泉与动力而于创作中不可或缺;而从属词、论词的重要评价标准上看,由“词心”所生发出的“吾词之真”是“不可强为”的,正是况氏“纯任自然,不假锤炼”^⑥的学词要求与“真字是词骨。情真、景真”^⑦的词作准衡之体现。更为重要的是,“无词境,即无词心”^⑧,作为“词心”实现的必要前提,“词境”于况氏是“万缘俱寂”而引发的“斯时若有无端哀怨触于万不得已”^⑨之作词状态,而涵泳前人词境,入乎其中,亦能实现“吾性灵与相浃而俱化,乃真实为吾有而外物不能夺”^⑩的效果。若以词作境界解“词境”^⑪,况氏又两度摘引托名他人之旧作《织馀琐述》,以“似平淡无奇,却情深而意真”为“至佳之词境”^⑫,奉“委心任运,不失其为我”^⑬为词境至高,足见对本真情感的推崇,而其推扬“词境以深静为至”时,明确指出“盖写景与言情,非二事也。善言情者,但写景而情在其中”^⑭,颇通于袁宏道“机境偶触,文忽生焉”^⑮之言,则“词境”“性灵”之系联毋须多言。

概而论之,为力矫常州词派“呆寄托”之流弊,以推举“词心”为思想核心,况氏词论所涉诸多范畴,皆与之系联而成其词学“性灵”之说。而论及蕙风圆融常派之论、总结前人旧说而于词学“性灵”之创辟,考察《蕙风词话》的具体阐论,又不拘于“词心”等范畴的提出;回到“即性灵,即寄托”之词论主张,亦能见出其特有的词论立场和审美特质。

① 况周颐著,孙克强导读:《蕙风词话》卷一《以吾言写吾心》,第9-10页。

② 冯煦提出:“昔张天如论相如之赋云:‘他人之赋,赋才也,长卿,赋心也。’予于少游之词亦云。他人之词,词才也,少游,词心也。得之于内,不可以传。虽子瞻之明隽,耆卿之幽秀,犹若有瞠乎后者,况其下邪?”参见冯煦《蒿庵论词·论秦观词》,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3586-3587页。

③ 况周颐著,孙克强导读:《蕙风词话》卷二《周姜词朴厚》,第29页。

④ 况周颐著,孙克强导读:《蕙风词话》卷一《学词须先读词》,第13页。

⑤ 袁枚著,王英志编纂校点:《小仓山房文集·续文集》卷三十《答戴园论诗书》,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595页。

⑥ 况周颐著,孙克强导读:《蕙风词话》卷一《学词须按程序》,第8页。

⑦ 况周颐著,孙克强导读:《蕙风词话》卷一《真字是词骨》,第6页。

⑧ 况周颐著,孙克强导读:《蕙风词话》卷一《无词境即无词心》,第5页。

⑨ 况周颐著,孙克强导读:《蕙风词话》卷一《述所历词境》,第9页。

⑩ 况周颐著,孙克强导读:《蕙风词话》卷一《读词之法》,第9页。

⑪ “词境”一词,从词义观之,创作者自其出,则偏指创作状态;欣赏者由其入,则又指词学意境。黄霖曾指出况氏所谓“词境”有“作家构思时的精神境界”与“作品呈现出的艺术境界”两种之分。参见黄霖《近代文学批评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20页。

⑫ 况周颐著,孙克强导读:《蕙风词话》卷一《求词词外》,第19页。

⑬ 况周颐著,孙克强导读:《蕙风词话》卷二《洪文惠盘洲词》,第37页。

⑭ 况周颐著,孙克强导读:《蕙风词话》卷二《韩持国词深静》,第25页。

⑮ 袁宏道著,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未编稿·行素园存稿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571页。

三、“即性灵,即寄托”:况氏词学“性灵”说的词论立场与审美特质

一如前文所述,况氏引“性灵”之内涵,入常州词派“寄托”理论,形成其“即性灵,即寄托”的词学“性灵”说。其贵寄托而求于“弗克自己”,通“性灵”而重“身世之感”,无论对崇于寄托的常州词派,还是倡导真情抒发的“性灵”,都是一种调和。就这种调和而言,蕙风十分注重分寸感。其曾提出:“凡题咏之作,遣词当有分寸。”^①评许有壬《圭塘乐府》时,亦言及“度胜”为评价准绳,此处之“度”,便为属词分寸的体现。而这种合度的分寸感也体现在他的词学立论中,表现为对“性灵”与“寄托”恰到好处地融通。

“恰到好处”者,乃况氏借王鹏运语所提出的属词要点:“恰到好处,恰够消息。毋不及,毋太过。”^②若以此观其词论对于前人“寄托”与“性灵”论述的取舍,也可谓确切。况氏的词论取舍本身便可见出其主观审美倾向。《蕙风词话》对“性灵”与“寄托”的兼收并蓄,且将两者融合得“恰到好处”,堪为其词学“性灵”说的审美特质所在。而这种审美特质则具体展现于况氏趋于“性灵”的“重拙大”之词论吸收改造,“即性灵,即寄托”而归于客观持正的词史观,以及“性灵”与“书卷”并举的填词之道中。

其一,况氏针对前人词论的吸收改造,表现为趋于“性灵”的“重拙大”。

“重拙大”理论可谓《蕙风词话》中最为突出且核心的范畴,况氏词学体系即以此构筑。故况氏对前人词论的吸收、改造主要便体现在对“重拙大”的论述取舍上。关于“重拙大”理论,《蕙风词话》专辟一条称:“作词有三要,曰重、拙、大。”^③又在全书多处予以闡:“重”即“沉着”,乃“厚之发见乎外者”^④,是建立在深厚情感之上的寄托;而“拙”者,况氏以“词太做,嫌琢。太不做,嫌率”之言,明确其应为拙与巧的“恰如分际”^⑤,即要求作词不过分雕琢或流于粗鄙;而评《玲珑四犯》时,蕙风题以“有寄托”,又自注“斯旨可以语大”,将“大”义指向“寄托”^⑥。

事实上,此“重拙大”理论并非肇自况氏,乃王鹏运习自端木埰,况氏又接受并改造而成。赵尊岳曾谈及况氏“自佑遐进以重大之说,乃渐就为白石,为美成,以抵于大成”^⑦,明确王鹏运为况氏“重拙大”理论的沿袭之源。况氏的词论取向,从其对于王鹏运“重拙大”理论的取舍变化之处则可窥知。

在论及《花间》词笔时,况氏曾引王氏“奚翹艳而已?直是大且重”^⑧之语,从中不难看出,王氏从艳词观得立意之重大,其所重者在乎家国之思的寄托内涵。蕙风则将“沉着”释为“情真理足,笔力能包举之。纯任自然,不假锤炼”^⑨,不囿诗教君国,将寄托涵盖一切真情实感。

而王、况之异,亦在梦窗词评。二人皆推尊梦窗词,体认角度却各不相同。与王鹏运赞其“无一字无来历”^⑩的重故实之用相比,况氏则推崇吴文英内在情感的沉厚真挚,“即其芬菲铿丽之作,中间隳句艳字,莫不有沉挚之思,灏瀚之气,挟之以流转。令人玩索而不能尽,则其中之所存者厚”^⑪。可见,况氏更讲究“以性灵语咏物,以沉著之笔达出,斯为无上上乘”^⑫,将王氏对寄托的词格立意之大与典故用事之笔的追求,转向对自然性灵的词境和真实情感的推崇。自况氏对王鹏运观点的取舍之间,足见其对“性灵”与“寄托”观念的恰到好处的调节。而其对王氏“重拙大”的吸取,亦表现出“性灵”的趋向。

① 况周颐著,孙克强导读:《蕙风词话》卷五《题咏当有分寸》,第153页。

② 况周颐著,孙克强导读:《蕙风词话》卷一《词宜恰到好处》,第6页。

③ 况周颐著,孙克强导读:《蕙风词话》卷一《作词有三要》,第4页。

④ 况周颐著,孙克强导读:《蕙风词话》卷二《梦窗与苏辛殊流同源》,第52页。

⑤ 况周颐著,孙克强导读:《蕙风词话》卷一《词不宜琢率》,第6页。

⑥ 况周颐著,孙克强导读:《蕙风词话》卷一《玉梅玲珑四犯有寄托》,第21-22页。

⑦ 赵尊岳:《蕙风词史》,龙沐勋编:《词学季刊》第1卷第4号,上海:上海书店,1985年,第69页。

⑧ 况周颐著,孙克强导读:《蕙风词话》卷二《欧阳炯艳词》,第25页。

⑨ 况周颐著,孙克强导读:《蕙风词话》卷一《学词须按程序》,第8页。

⑩ 王鹏运:《四印斋所刻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890页。

⑪ 况周颐著,孙克强导读:《蕙风词话》卷二《梦窗与苏辛殊流同源》,第52页。

⑫ 况周颐著,孙克强导读:《蕙风词话》卷五《咏物语须沉著》,第153页。

其二,在词史观上,况氏坚持“即性灵,即寄托”而归于客观持正。

名以“词话”,《蕙风词话》却堪称词史。词之兴者晚于五代,而该书第一卷总括词史观念,自第二卷论及唐五代、两宋词,第三卷评金元词,卷五前半部分又谈明清词,全本大量涉及各代词作评论。千年词史的评论、总结中,况周颐词学理论的价值取向可以显见。

就词体之渊源而言,延续常州词派推尊词体之说,蕙风开篇便指出“词非诗馀”“词非诗之剩义”,且较之张惠言词与诗赋同流的说法,况氏沿流溯源,称“自有元音,上通雅乐。别黑白而定一尊,亘古今而不敝矣”,且更进一步地明确词体“独造之诣,非有所附丽,若为骈枝也”^①的独特价值,并提出关于“诗馀”的创设性认识,其称“词之情文节奏,并皆有余于诗”为误解的“世俗之说”,而以“赢馀”释“馀”^②。自立门楣,使词体进一步脱离诗之附庸的地位。

于具体的词史评价上,况氏也表现出对常州词派观念的吸收。比如基于常州词派的词史观,其于五代词史中最为推崇花间词派,“词有穆之一境,静而兼厚、重、大也。淡而穆不易,浓而穆更难。知此,可以读《花间集》”^③;就两宋词而言,其立足于家国寄托,赞扬“南宋遗民,寄托遥深,音节激楚”^④,将“南渡诸贤不可及处”^⑤归结于其合乎“重拙大”的兴寄托旨;至于清词,况氏力斥常州词派所极力批评的浙派,指出“东南操觚之士,往往高语清空,而所得者薄。力求新艳,而其病也尖”^⑥的尖薄之弊。

而从另一方面看,较之常州词派,况周颐的词史观又极具创见。其将自身的“性灵”推崇,融入对常州词派“呆寄托”的匡正中,于词史提出不同看法。首先,虽然周济、张惠言等人也对花间词人推崇备至,但在况氏看来则只是“揭橥《花间》,自附高格,涂饰金粉,绝无内心”^⑦的因袭附会。蕙风称花间词派“高绝,即或词学甚深”^⑧,又赞五代词“其铮铮佼佼者,如李重光之性灵”之“艳而有骨,只是艳骨”^⑨,皆出于其对袒露“内心”、抒发“性灵”的推崇,无关牵强寄托。其次,两宋词之评鹭,况氏固然以家国寄托而盛赞“南渡诸贤”,却同样以“善言情者”称扬此为“唯北宋人词”之“境界”^⑩,直言对《清真词》“至真之情,由性灵肺腑中流出”^⑪的欣赏。复次,况氏虽认为“词衰于元”^⑫,却最服膺刘因,一如所引王鹏运“朴厚深醇中有真趣洋溢,是性情语,无道学气”之评,其所重者在“于性灵怀抱,胥有裨益”^⑬。此外,清词中蕙风谓“纳兰容若为国初第一词手”,亦出于对其词作“纯任性灵,纤尘不染”^⑭之赞可。

可见,况周颐坚持将“不执己,不徇人,不强分时代,令一切矜新之异者之废然返也”^⑮作为评价词史的基本原则,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反对以宗派的标准来评价词作。在评论两宋词时,他反对出于宗派观念的轩轻之见,提出“非必墨守一家之言”^⑯,应通过潜心体会,取长补短。由此观点出发,其虽在卷一中就针对各代词史提出“不必学唐五代词”“北宋人手高眼低”“宋词宜多读、多看”“明以后词纤庸少骨”等整体评价,却能在具体论及词人词作时各取特点,褒贬不拘于时代、不囿于门户派别。比如,其虽对浙西词派总体持批判态度,却仍在清初词人中推举朱彝尊为冠,亦是其不以宗派意

① 况周颐著,孙克强导读:《蕙风词话》卷一《词非诗馀》,第3-4页。

② 况周颐著,孙克强导读:《蕙风词话》卷一《词非诗之剩义》,第4页。

③ 况周颐著,孙克强导读:《蕙风词话》卷二《词有穆之一境》,第23页。

④ 况周颐著,孙克强导读:《蕙风词话》卷三《元诗馀》,第88页。

⑤ 况周颐著,孙克强导读:《蕙风词话》卷一《作词有三要》,第4页。

⑥ 况周颐著,孙克强导读:《蕙风词话》卷五《饮水诗》,第144页。

⑦ 况周颐著,孙克强导读:《蕙风词话》卷一《不必学唐五代词》,第17页。

⑧ 况周颐著,孙克强导读:《蕙风词话》卷二《花间不易学》,第23页。

⑨ 况周颐著,孙克强导读:《蕙风词话》卷一《不必学唐五代词》,第17页。

⑩ 况周颐著,孙克强导读:《蕙风词话》卷二《韩持国词深静》,第25页。

⑪ 况周颐著,孙克强导读:《蕙风词话》卷二《周姜词朴厚》,第29页。

⑫ 况周颐著,孙克强导读:《蕙风词话》卷二《词衰于元》,第48页。

⑬ 况周颐著,孙克强导读:《蕙风词话》卷三《刘文靖词朴厚》,第84页。

⑭ 况周颐著,孙克强导读:《蕙风词话》卷五《饮水诗》,第144页。

⑮ 况周颐著,孙克强导读:《蕙风词话·蕙风词话续编》卷一《顾梁汾序侯刻词》,第173-174页。此言虽自顾贞观,况氏“见地绝高”之评,态度已不昭自明。

⑯ 况周颐著,孙克强导读:《蕙风词话》卷一《宋词宜多读多看》,第16-17页。

气论词之证。

事实上,况氏所以秉承这样不以时代派别定贵贱、客观持正的词史观,亦是因为能融“性灵”于词论,“以词心观照词史、以词史印证词心”^①。这也是其入乎常州词派而能识其弊处的根本原因。

其三,况氏述填词之道,并举“性灵”与“书卷”为倡。

作为著论兼擅的词学大家,况周颐结合自身创作实践的经验,提出“性灵”与“书卷”并举的填词之道:

必欲得之,其道有二。曰性灵流露,曰书卷酝酿。性灵关天分,书卷关学力^②。

填词要天资,要学力。平日之阅历,目前之境界,亦与有关系^③。

以上论述中,“性情”通于“性灵”,关乎“天分”,“书卷”则关乎“学力”,况氏视之为填词创作最重要的条件。“平日之阅历”“目前之境界”虽“亦有关系”,然自其遣词,“性情”“书卷”当为最不可或缺者。由此,况氏并举“性灵”与“书卷”,作为属词两大重要条件。

于属词之道,蕙风十分看重“性灵”,视“吾词”为“以吾言写吾心”的产物。其虽指出“书卷多”对于“吾言尤易出”之益处,却似乎又更偏向对“吾心”之“性灵”的推崇,倡导“吾心为主”^④。在他看来,“性灵”为“真实为吾有而外物不能夺”^⑤。这种“由吾心酝酿而出”而“万不得已”的灵感,“非可强为,亦无庸强求”^⑥。

同时,况氏大力推崇自“书卷酝酿”的“学力”,称“学力果充,虽天分少逊,必有资深逢源之一日。书卷不负人也。中年以后,天分便不可恃。苟无学力,日见其衰退而已”^⑦。在他看来,“学力”充沛可稍补“天分”不足,且随着年岁增长,“学力”比“天分”更可以依恃,故而要留心于书卷。

“书卷”与“性灵”之并举,况氏将之融通于“词外求词”的过程中。其谓“求词词外”当得之于“看似平淡无奇,却情深而意真”^⑧,又言“词外求词之道”须“多读书”^⑨。在况氏看来,“学填词,先学读词。抑扬顿挫,心领神会。日久,胸次郁勃,信手拈来,自然丰神谐鬯矣”^⑩。自书卷中积累前人词作的基础上,胸次中“性灵”的感悟自然而然,由此,“于性情得所养,于书卷观其通”^⑪,便可于词外而得之词。此“性灵”与“书卷”并举之论,尽得袁枚“役使万书籍,不汨方寸灵”^⑫之意。

(责任编辑 刘 英)

① 梅向东:《论况周颐对明词的重新评价——兼及况氏之词心史观》,《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1期。

② 况周颐著,孙克强导读:《蕙风词话》卷一《选句要自然》,第8页。

③ 况周颐著,孙克强导读:《蕙风词话》卷一《无词境即无词心》,第5页。

④ 况周颐著,孙克强导读:《蕙风词话》卷一《以吾言写吾心》,第9-10页。

⑤ 况周颐著,孙克强导读:《蕙风词话》卷一《读词之法》,第9页。

⑥ 况周颐著,孙克强导读:《蕙风词话》卷一《以吾言写吾心》,第9-10页。

⑦ 况周颐著,孙克强导读:《蕙风词话》卷一《选句要自然》,第8页。

⑧ 况周颐著,孙克强导读:《蕙风词话》卷一《求词词外》,第19页。

⑨ 况周颐著,孙克强导读:《蕙风词话》卷一《词外求词》,第4页。

⑩ 况周颐著,孙克强导读:《蕙风词话》卷一《学词须先读词》,第13页。

⑪ 况周颐著,孙克强导读:《蕙风词话》卷一《学词须按程序》,第7页。

⑫ 袁枚著,王英志编纂校点:《小仓山房诗集》卷十五《改诗》,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11页。